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政治历史卷

辽海出版社

中外关系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政治历史卷 •

中 外 关 系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倡的佛教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这一宗教斗争反映着赞普王权与藏地贵族世家的权力之争。赞普先聘请印度瑜伽中观派论师寂护（亦译作静命，Sāntaraksita），入藏弘扬佛法，然而寂护的说教不足以克服钵教势力的抵抗。赞普继又聘请莲华生入藏弘法。在与钵教斗争的过程中，擅长符咒的莲华生显然比寂护更起作用，因而使藏地佛教带上了密宗色彩。他不仅被奉为西藏密宗宁玛派（红派）的祖师，而且也受西藏喇嘛教其他各派的敬奉。

莲华生在西藏佛教史上另一重大事迹是他协助藏地最早的佛教寺院——桑鸢寺（bsam - yas）的奠基工作，并参与其开光典礼。莲华生在藏五十余年，约在 802 年返回故土。

李珣

唐末五代时期侨居成都的波斯人后裔（一说唐肃宗、代宗时人，证据不足）。字德润。有诗才，著有《琼瑶集》。卖药为业，纂有《海药本草》四卷，记载大食、波斯等地医药物。唐玄宗时郑虔著《胡本草》、唐宣宗时段成式著《酉阳杂俎》都对海外名香奇药有所记载，但是不如李珣书完备。《海药本草》原卷已佚，其中多条材料散见于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李珣一族的事迹很值得注意。李珣兄弟五人，祖父波斯人。四弟玘，字廷仪，亦称李四郎，也以出售香药为生业。中和元年（881），唐僖宗因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而逃至成都，授李玘为率府率（皇太子侍卫军的将领），李玘因有诗名也得预“宾贡”之列，参加科举考试。妹舜玘，为前蜀王衍昭仪，尤以诗才闻名。

蒲寿庚

宋、元之际的大商人。祖籍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南宋时随其家由广州移居泉州。他拥有大量海船，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商人

首领。自宋理宗淳祐五年或六年（1245 或 1246）至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蒲寿庚为泉州提举市舶 30 年。当宋度宗咸淳末（1271 ~ 1274），与其兄寿晟因子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后又授福建、广东招抚使，统领闽、广海舶，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蒲寿庚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同年奉元世祖之命招谕海外，恢复互市，对恢复海外贸易起了一定作用。

也里可温

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又译作也里克温、也立乔。或称迭屑（tarsa），即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见的“达娑”，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源自希腊语 ερχων。基督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在唐初传入中国，称大秦景教。845 年唐武宗灭佛，所有西来的宗教都被禁止，景教遂趋绝灭。辽、金时期，它在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又颇为盛行。蒙古几次西征中，大批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被裹胁或俘掠东来，充任官吏、军将、工匠或勒充驱奴，其中大多数随着蒙古统治者进入内地，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据载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聂思脱里派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罗马天主教则是在 1294 年左右由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罗马教廷在 1307 年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与东方总主教。随后在泉州也建立了主教区。

元朝对于各大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广蓄兼容。基督教和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可以自由传教，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仁宗延佑二年（1315），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72所，足见当时基督教在全国分布之广。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户并举，也说明这种人遍及各路，人数相当多。以镇江为例，就建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所聂思脱里教派的道院；在3845家侨寓户中，也里可温为23家。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但规定“种田人租，贸易输税”。这些教徒依仗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多方逃避赋税，因此这一条规定屡申屡坏。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其他以政事、特长而见于记载的基督教徒甚多，他们中有的已具有颇高的汉文化修养。

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又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答失蛮

元代伊斯兰教士称号。或作达失蛮、大石马，宋代文献曾译作打厮蛮。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徒尊称其教师、神学家为 Dānish - mand，波斯语“有知识者”之意，方言作 Dāshumand。《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国中有称大石马者，识其国字，专掌簿籍”。蒙古人最初接触的是中亚伊斯兰教徒，故用此称号来概称伊斯兰教士，蒙古语作 da šman，答失蛮即其音译。其职为掌管密昔吉（阿拉伯语 mesjid 的元代音译，即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学校（madrasa），主持诵经、祈祷及教育等宗教

事务。元朝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答失蛮与和尚、先生（道士）、也里可温大师（基督教教士）同被视为“告天祝寿底人”，享受免除赋役的特权，但规定需是“在寺住坐”，别无营运产业者。元代入居中国的伊斯兰教徒（见木速蛮）很多，大都、上都及外省各城邑皆有其聚居地区，各有答失蛮掌教务，哈的大师（阿拉伯语 qadi，伊斯兰教法官）掌审判。答失蛮多经营商业，且夹带、影蔽俗人做买卖不纳商税，亏损国家课收，元朝曾多次下令禁止，但效果不大。答失蛮也被用作人名。

木速蛮

元代伊斯兰教教徒的译名，又作谋速鲁蛮、没速鲁蛮、铺速满，波斯语 muslimān 的音译，即阿拉伯语 Muslim（穆斯林）。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将西域各族木速蛮称为回回。但回回之名有时也被用于称呼信奉其他宗教的西域人，如称犹太人为“术忽回回”等。

元朝境内的木速蛮，大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小部分是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蒙古西征中，每克一城，照例都要括取工匠和俘掠妇孺为奴，仅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被迁往东方的工匠就超过十万人，撒麻耳干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被俘工匠也达三万人。还有许多青壮年被签为军队，充当前锋，有不少人随蒙古军东来。这些被迫东迁的中亚人多数是木速蛮。木速蛮商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早在蒙古兴起以前，他们就经常来往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纵了游牧民与农业地区间的贸易。成吉思汗建国后，许多木速蛮商人投充蒙古贵族的“斡脱”，替他们经商、放债牟利。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部属二三

人组成了一支 450 人的大商队，赴花刺子模贸易，成员全是木速蛮。随着蒙古对西域诸国的征服和驿道的设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蒙古统治者对西域商人又给予种种优待，因此元代来中国经商的西域各地木速蛮商人远较前代为多。

木速蛮在元代属色目人的一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统治者为防制汉人、南人，重用色目，许多木速蛮上层人物成为蒙古国和元朝的高官显宦。著名者如花刺子模人牙老瓦赤，从窝阔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时代（除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外）一直担任统辖中原汉地的札鲁忽赤（汉称燕京行尚书省事）；大商人奥都剌合蛮以扑买中原课税，被窝阔台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世祖时的赛典赤父子、阿合马，武宗至仁宗时的合散（一译阿散）、泰定帝时的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权。在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为数更多。至元二年（126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回回工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罢汉人任达鲁花赤者，但回回人已任的仍旧；次年又规定，准许任用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为达鲁花赤。以镇江路为例，世祖至文宗时期的二十一任达鲁花赤中，有回回五人；所属录事司和各县达鲁花赤中，回回居 1/3 左右。

木速蛮商人在元朝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刺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元人说，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中统四年（126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 2953 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泉州大食人蒲寿庚

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子蒲师文任宜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八十艘，家产仅珍珠就有130斛。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木速蛮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

从中亚、波斯各地迁来的大批木速蛮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酿酒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他们生产的“纳失失”（波斯语 *nasij*，织金锦缎）最著名，是缝制元朝宫廷宴飨礼服“只孙服”的主要原料。专门织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市西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汗在位时以回回人匠三千户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同时设置的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领有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工匠织造纳失失。元世祖时，伊利汗阿八哈遣来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所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巨石，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于是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签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他们指导下制造、使用回回炮。西域木速蛮工匠的迁入，促进了中西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元代手工业的进步。

元代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时期，入居的木速蛮对元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术、文史、音乐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应忽必烈之召东来，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仪器。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观测衍历，以札马鲁丁为提点，集中了一批木速蛮天文学家在其中工作。由于元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木速

蛮居民，回回历也成为元朝通行的历法之一。在元朝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木速蛮医生，用他们本国的医术和所谓“回回药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元朝中书省礼部属下设常和署，专一管领回回乐人，回回乐也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木速蛮人久居中国，学习汉族文化，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赡思、萨都刺、高克恭、丁鹤年等，他们的作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之一。

木速蛮移民入居元朝后，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给予伊斯兰教掌教人员答失蛮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mesjid，元代音译密昔吉，俗称回回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政府的保护。木速蛮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政府设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官称号），掌管木速蛮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天历元年（1328），因木速蛮大臣倒刺沙等拥立泰定帝子，与元文宗对抗，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所，并命各地追究倒刺沙的同党，木速蛮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可见这只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斗争。元末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拔图塔报道说，当时中国每城都有木速蛮的居住区，各有主教（Shaikh al - Islam）总管有关教民的一切事务，一“哈的”掌审判（大概木速蛮们自相诉讼仍由哈的决断是非）；各地木速蛮都在自己的居住区建有礼拜寺，以为祈祷之所。据至正八年（1348）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

其寺万余”。木速蛮移民散居在中国各地，编入当地户籍，另为一类，通称回回户。元朝政府规定，除答失蛮等掌教念经者外，一般回回民户，需与其他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回回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相处，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习汉语，读儒书，并仿效汉人的姓氏名号定姓立名，自元中叶以后逐渐普遍。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世代不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后来形成为中国的回族。

普兰诺·卡尔平尼

（约1182~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务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历任德国、西班牙、萨克森等教区的大主教。1241年，蒙古军攻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欧洲震惊。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并先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说他们停止杀掠和侵犯基督教国家，并了解蒙古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情况。当年4月，普兰诺·卡尔平尼携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从里昂出发，取道孛烈儿、斡罗恩，于1246年4月，抵达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汗。拔都命他前往蒙古觐见大汗。7月，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刺斡耳朵。8月，参加了蒙古诸王大将推举贵由为蒙古大汗的盛典。11月，他带着贵由汗答教皇的诏书仍由陆路西归。1247年秋，回到里昂，向教皇复命，并呈上贵由的诏书，以及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书中生动具体地记述了13世纪蒙古人的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宗教、政治、习惯法和蒙古军队组织、武器、作战策略等情况，及其旅行历程，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卢布鲁克

(约 1215 ~ 1270) 法国人, 圣方济各会士。他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亲信, 1248 ~ 1250 年, 曾伴随路易九世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侵。1253 年, 奉路易九世之命前往蒙古人处传教, 并了解有无可能拉拢蒙古统治者, 作为西欧各国发动的十字军东侵的同盟者参战。卢布鲁克从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 (Acre, 今海法北) 出发, 渡过黑海, 于同年秋到达伏尔加河畔, 谒见拔都汗。拔都认为自己无权准许他在蒙古人中传教, 便派他去见蒙古大汗蒙哥。12 月, 卢布鲁克到达和林南汪吉河 (今蒙古翁金河) 蒙哥冬季营地。1254 年 1 月, 他觐见蒙哥。4 月, 随同蒙哥来到蒙古国都城和林。7 月, 他带着蒙哥致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 于 1255 年回到地中海东岸。一年后, 他用拉丁文写成了给路易九世的出使报告, 即《东方行记》。他根据耳闻目睹, 生动具体地记述了 13 世纪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等情况, 还仔细记述了沿途所经山川湖泊、各地、各城以及不里阿耳、马札儿、钦察、阿兰、畏兀儿等各族的情况, 是研究早期蒙古史、中世纪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爱薛

(1227 ~ 1308) 仕于元朝的基督教徒。叙利亚西部操阿拉伯语的拂林人, 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 祖名不阿里, 父名不鲁麻失。爱薛又译海薛或也薛, 均为阿拉伯语 'Isa 的音译, 与今天译自西欧语的耶稣 (Jesus) 同名。1246 年, 叙利亚聂思脱里教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 (Simeón Rabban - ata) 东来参加贵由即位大典, 盛称不鲁麻失的才能。蒙哥之母唆鲁禾帖尼笃信基督教, 奏请贵由汗遣使邀请, 不鲁麻失以年高推辞。爱薛继承家学, 通晓西域多种语言, 擅长星历、医药之术, 代父应召, 入侍贵由汗

及唆鲁禾帖尼母子。爱薛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为妻，夫妻俩曾当过蒙哥汗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故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

忽必烈（见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爱薛仍当侍从，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官署。至元十年（1273），爱薛所创的京师医药院改为广惠司，仍由他管领，附带为有残疾的穷苦人治病施药。爱薛从基督教徒的立场出发，谏止忽必烈大作佛事。十六年，往八刺忽、火里、吉利吉思等地捕鹰隼的回回人，所过之处，羊非自杀者不吃，骚扰百姓。忽必烈下诏，禁止回回于自家杀羊，违者定罪，奴仆首告者释为良人，犯禁者财物都赏给首告人。爱薛等支持下达和推行这一禁令，回回受到沉重打击。

爱薛因通晓多种语言，曾多次以怯里马赤（kelemü čī，译人）的身分出使。二十年，奉诏随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于次年冬会见伊利汗阿鲁浑。二十二年，阿鲁浑致书教皇，提到爱薛等人的到来。孛罗被阿鲁浑所留用。爱薛备尝艰险，历时两年返回大都，以阿鲁浑汗所赠礼物进见。忽必烈认为他“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倍加器重。二十四年，爱薛被任为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二十六年，元廷置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十字寺（基督教堂）礼拜等事，爱薛兼崇福司使。三十一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加授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章政事。十一年，武宗即位，封爵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卒于上都。皇庆元年（1312），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追封他为拂林王，谥忠献。其子孙多人，继承家学，分任掌宗教、文字、星历、医药的崇福司、翰林国史院。司天台和广惠司等部门的官员。

马可·波罗

（1254～1324）中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威尼斯商人尼柯罗·波罗之子。马可·波罗出生前不久，尼柯罗与其弟马菲奥启

程往东方经商，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回国途中，逢钦察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发生战争，因路不安宁，折向东行，至不花刺（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留居约三年，遇旭烈兀派往元世祖忽必烈处的使臣路过，又随同东来，约于1265年抵上都。忽必烈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欧洲情况，并决定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69年，尼柯罗兄弟到达地中海东岸阿克拉城（Acre，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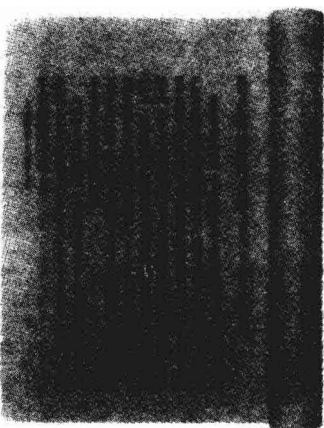


马可·波罗像

法北)，适逢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此时马可已十五岁。1271年夏，尼柯罗兄弟携马可同来元廷复命。他们到阿克拉见新任教皇格雷戈里十世，教皇派两名教士随同他们东行。途中，二教士畏难不前，将教皇致忽必烈的书信和出使特许状委托给尼柯罗等。于是，尼柯罗和马可等三人取道伊利汗国境，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至波斯湾港口忽里模子，原拟走海道，后决定仍走陆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巴达哈伤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元朝辖境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然后由南道继续东行，经斡端（今新疆和田）、罗布泊等地，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又经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宁夏（今宁夏银川）、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等地，于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他们侨居元朝17年。

据马可自述，因他聪明谨慎，擅长辞令，并学会了蒙古语言和骑射，受到忽必烈的喜爱，故得以留仕元朝，多次奉命出使各

地。借此，他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他在《行纪》中，对大都，上都、京兆（今陕西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等数十个中国名城作了记述。他对当时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典章制度以及各地自然和社会面貌的描述，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如所述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被杀事件，元朝的两都制度，宫廷宴飨，大都、上都、镇江、杭州、泉州等地情况，都可以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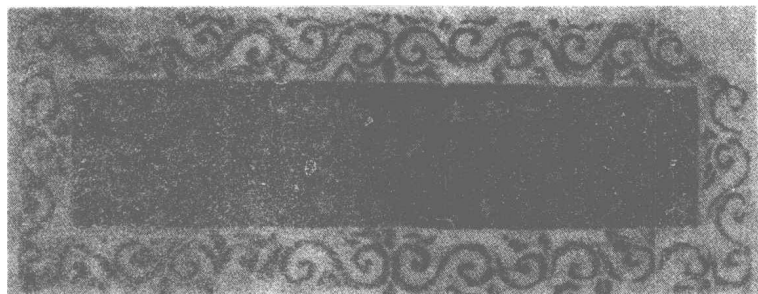


汉文史料中得到证明。但也有夸大失实之处和千篇一律的倾向，这说明有些内容只是得自传闻。他自称曾奉大汗之命治理扬州三年，这一点目前还得不到可靠的印证。

《马可·波罗游记》书影

马可及其父、叔久居中国后怀念故土，请求回国。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解、阿必失呵、火者三人来元朝请求续娶其亡妻本部女子，忽必烈命原使者护送选定的伯岳吾氏贵族之女阔阔真去伊利汗国，马可等三人获准随行还家。当时正值西北诸王叛乱，陆路不安全，他们由海路西行，约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在海上航行了两年零两月，备历艰险，始到达忽里模子。时阿鲁浑已死，其弟乞合都在位。1293年夏，使者奉乞合都之命，将阔阔真送到阿八哈耳，与阿鲁浑子合赞成婚。马可等人从桃里寺动身回国，于1295年返抵威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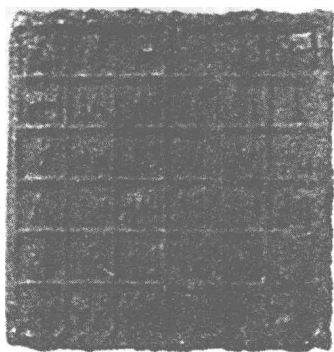
1296年，马可在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中被俘。他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的见闻，引起热那亚人极大兴趣，当局也因此给予优待。同狱小说家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将他口述内容笔录成旅行记一书，于1298年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



大元进贡宝货碑

可获释回家。这时，他已因游历东方而声名大著，并成为大富翁。他于 1324 年去世，遗体葬在圣劳伦佐教堂。

马可·波罗旅行记的原稿是用中古法一意混合语写成，后经不断传抄，并在传抄过程中被译成拉丁语、意大利各种方言和其他欧洲语言。原稿已佚，现存各种文字的抄本约一百四十种，其中以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所存塞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最早、最完备，以巴黎国立图书馆所存 B. N. fr. 1116 抄本的文字最接近原稿，1477 年在纽伦堡出版的德文译本是此书最早的刊本。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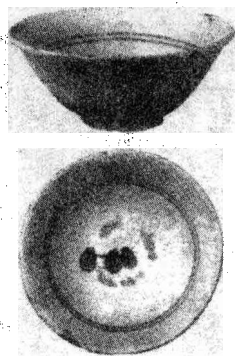


阿拉伯数字幻字铁板

已有各种文字的刊本 120 种以上。1938 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校订英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本子。此书之名，摩勒、伯希和本从塞拉达抄本原题作《寰宇记》（*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他本或作《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的生活》、《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各国奇事之书》、《百万》等，通常只称为《马可·波罗行记》。中国先后出过四种汉文全译本，以冯承钧译本

(《马可·波罗行记》，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流通最广。

马可·波罗的书在许多世纪中一直是欧洲人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主要依据之一。1375年编绘的喀塔兰大地图，其中亚和东亚部分都取材于此书。从15世纪起，欧洲的航海家和探险家普遍受到它的影响，例如哥伦布即曾熟读此书，向东寻找日本国，就是促成他决心出航的一大因素。但也有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甚至视之为异端邪说。19世纪以来，经过各国学术界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人们公认此书在中世纪亚洲的地理、民族、风俗、物产、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1941年，中国学者杨志玖从《经世大典·站赤》中找到了有关阿鲁浑所遣三使臣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波罗所述相符。英国学者波义耳也从《史集》中找到了三使臣护送阔阔真到达伊利汗国的记载。于是，马可·波罗来华及其记述的真实性又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指南针碗

列班·扫马

(? ~1294) 元朝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最早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旅行家。列班(Rabban)，叙利亚语“教师”之意，聂思脱里派教士的称号，扫马(Sauma)，其名。大都人，出身于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突厥族(当是畏兀儿)富家。父昔班，任教会视察员。扫马自幼受宗教教育，20多岁时弃家修行，居于大都附近山中，成为著名教士。东胜州(今蒙古托克托)人马忽思(Marcus)来向他学习。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两人

决意赴耶路撒冷朝圣，得到朝廷颁发的铺马圣旨（见站赤），从大都出发，随商队西行。沿途经过东胜、宁夏（今宁夏银川）、斡端（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答刺速河、徒思（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等地，抵伊利汗国蔑刺哈城（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谒见了聂思脱里派教长马儿·腆合（Mar Denha）。随后历访波斯西部、亚美尼亚、谷儿只（今格鲁吉亚）等地，参观基督教遗迹，但因当时叙利亚北部常有战乱，去耶路撒冷朝圣的计划未能实现，便寓居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教堂。马儿·腆合召两人至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任命马忽思为大都和汪占部主教，改其名为雅八·阿罗诃；扫马为教会巡视总监，遣返东方，因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在阿姆河一带发生战争，道路不通，还居寓所。1281年，马儿·腆合去世，马忽思被选为新教长，称雅八·阿罗诃三世（Yahbh - Allaha III）。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欲联合基督教国家攻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遣扫马出使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扫马使团经君士坦丁堡至罗马，恰遇教皇虚位，于是继续西行抵巴黎，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品，受到隆重接待。在巴黎逗留月余，又到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城，会见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法、英两王都同意与伊利汗国建立联盟。1288年，扫马在回国途中，获悉新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已即位，再至罗马呈交国书。教皇对阿鲁浑污优待基督教表示感谢，厚赠使臣礼品遣归。扫马圆满完成出使任务，受到阿鲁浑汗的嘉奖，特许在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宫门旁兴建教堂一所，命他管领。后移居蔑刺哈，又建一宏伟教堂。1293年去报达，辅佐雅八·阿罗诃三世管理教务，直到去世。扫马的出使，使罗马教廷更相信元朝皇帝与各汗国统治者均崇信基督教，因而遣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东来，对促进东西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扫马用波斯文著有旅行记，原稿已佚，1887年发现的叙利